



「唐宋變革論」在新興的全球史中如何定位？

Positing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Discourse in the New Global History

孫隆基 (Sun Lung-kee) *

西方的比較歷史學和全球史領域目前流行「去西方中心論」，在其中「唐宋變革論」扮演了一個耀眼的角色。在 20 世紀早期，日本的內藤湖南已有中國率先進入「世界近世史」的觀點。但內藤志不在去西方中心，而正是用西式「時代觀」淘汰中國舊史學的「朝代觀」，乃是將中國史學進行西化之先驅者之一。

內藤的中國先行論既非爲了貶抑西方、亦非爲了抬舉中國，而是方便他診斷現代中國已過了早春、淪爲遲暮的古典文化，在當今之世猶如處於羅馬時代的雅典，中國該安於充當文化典範的角色，在東亞雄飛猛進之業當留給壯年如羅馬的日本，故此他不讚許袁世凱的強人政治，並認爲民國之建立乃不合時宜。¹ 這個觀點還必須置放入 19、20 世紀之交「文明沒落論」大盛期的脈絡中重新讀解。² 內藤雖爲日本大東亞主義的吹鼓手，其「宋代乃世界近代化之早春」說卻頗有賣點，它是

「唐宋變革論」的老祖宗。

至民國初年，內藤氏的「宋代乃世界近代化之早春」命題已被介紹至中國。但唐宋之際乃國史的一個分水嶺之命題並非日本學者之專利，中國史學界從陳寅恪到錢穆都有類似看法。³ 爲時雖稍晚，但強調重點和內藤的不同，不得謂拾人牙慧。中國學者的「唐宋變革論」多限於國史範圍，不涉及整個東亞，更遑論全球史。這就讓內藤命題在近期西方的全球史領域裡獨占了鰲頭。

至 1960 年代，美國戰後的現代化理論和經濟成長論的霸權漸趨式微。⁴ 史學和社會科學在其陰影底下解放出來，開始質疑直線一條的進步階段論，既然不一定有一條固定的田徑賽跑道，西方選手就不一定總是冠軍。1973 年，「唐宋變革論」終於透過澳洲的中國史學者伊懋可 (Mark Elvin) 的《中國的歷史格局》(The

* 作者爲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

1 Joshua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o Konan (1866-1934)*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 內藤除了應用西洋史的上古、中古、近代三分法來重新架構中國史外，還有一絲如今已被忽略但當時紅極一時的文明沒落論的靈感。可舉一些例子：美國人亞當斯 (Brook Adams) 在 1895 發表的《文明與衰敗的定律》(Law of Civilization and Decay)、同年，英國小說家威爾斯發表人類窮途、地球死亡的科幻小說《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1918 年，德國人史賓格勒發表《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21 年，上述的威爾斯發表《文明的拯救》(The Salving of Civilization)；1923 年，史懷哲發表他的《文明的衰敗與復興》(The Decay and Restoration of Civilization)；同年，費邊社的韋拔夫婦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的《資本主義文明的衰敗》(Decay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英國史學家湯因比和俄國社會學家梭羅金 (Pitirim A. Sorokin) 後來警惕文明出現危機的宏篇巨著之靈感皆奠基於此時。

3 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趙雨樂，〈論孫國棟及其唐宋變革論的史學視野〉，皆載於《唐研究》第 11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14、636-638。

4 主要指派深恩 (Talcott Parsons) 的現代化理論與羅斯托 (W. W. Rostow) 的經濟成長論。

國家教育研究院
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
臺北院區 期刊學用庫

漢學研究通訊 32:3 (總 127 期) 民國 102 年 8 月 1

建檔

上架

652 26-4 <421809>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闖入歐美全球史學域的視野。

伊懋可指出：由晚唐至宋初，生鐵的產量翻了幾倍，至 11 世紀末，年產量可高達 125,000 噸，它由煤的革命性使用促成。宋的煤鐵業，因國防需要，成為世界史上最早具標準化的大規模生產，大運河則予此國防體制以史無前例的補給系統。宋人在戰場上首先用火藥，將爆破力提升的卻是金人，火藥與鐵為世界史的蒙古時代奠下基礎。至 11 世紀，宋代貨幣的流通量達唐高峰期的 20 倍，並出現世界最早的紙幣和匯票。在晚唐，官市大多讓位給自由市場，入宋以來，市場機制滲入農村，有些商品如米和紙張出現全國性市場，跨區的大宗貿易成為常態，從事經濟作物的地區一般進口糧食。至 13 世紀中葉，都市人口達全國的 28%。從 10 至 14 世紀，中國出現一連串的科技突破，但至 14 世紀卻戛然而止。⁵

伊懋可似乎服膺李約瑟「14 世紀前世界重大技術創新大半發生在中國」的命題。至明清時代，中國的先進反而使自己陷入了「高度的平衡陷阱」(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⁶ 換而言之，他試圖說明中國為何未能走完現代化之路，其觀點仍然是單軌的，與近年來的「大分流」說並非一個路子。在維持單軌發展史觀的設定下，《中國的歷史格局》導致美國全球史家麥克尼爾 (William McNeill) 的自我修正。麥氏曾在 1963 年的《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 裡把世界史分成 3 期：中東支配的時代、歐亞文化平衡時代、西方興起的時代。其本意與史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打對臺，卻無意中變成旗幟鮮明的西方中心史觀。麥克尼爾對此頗自覺，在 1982 年《逐富競強》(*The Pursuit of Power*) 中修正陳說，將宋代升格為第 3 期之序曲，全球近代化由宋代開了頭，後面的路由西方走下去，但走的仍然是同一條路。

在麥克尼爾這段演變的同時，左翼史學也在醞釀變化。世界社會主義陣營並不認可戰後西方學術界的現代化論與經濟起飛論，評斥其為資產階級學說。然而，當越戰處於白熱階段，而中國的文革也進行得如火如荼的

年代，林彪提出了「世界鄉村包圍世界城市」的全球戰略，不可謂不左矣，但仍不啻肯定西方乃中心、中國與第三世界是邊緣。在二戰前後，能挑戰西方之優勢者唯日本，但後者志在「脫亞入歐」，並無動搖西式進步軌跡的典範性。只有當歐、美、日本分享世界經濟這塊大餅的片塊開始變小，同時——似乎很弔詭——在老牌的反帝意識形態馬列主義也過氣後，西方中心論才真正動搖。這也是為什麼較晚近的后現代主義「去中心論」必待馬克思主義史學偃旗息鼓，方能有所作為。

在世界反帝浪潮高漲的 1970 年代，美國左翼史學的創新在提出「現代世界體系」之說：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將資本主義的發展史簡約為西方之擷取世界中心的地位、把非西方地區淪為外緣，並在兩者間製造中間地帶。這與毛澤東的三個地帶論——第一世界、中間地帶（偶稱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何其相似！但華勒斯坦遲至 1989 年方出版《現代世界體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 第 3 冊，已是明日黃花，蓋行將進入 1990 年代，西方中心論已岌岌可危。

華勒斯坦的思維模式仍然是經濟決定論，亦即是寫作於後現代主義還未當道的年代，後者視任何「中心」皆為話語建構，可用詮釋策略將其解構。經濟決定論是唯物史觀的基礎，何謂先進、何謂落後，全視生產方式，毫無主觀餘地，在方法學上就與後現代、後結構、後殖民諸般當代顯學講究「詮釋策略」大異其趣。但唯物史觀其實仍是一種「詮釋策略」，其門徒戴上「唯物」的眼罩，看不到而已。因受這種客觀主義的框限，與華勒斯坦同代、同路數的法蘭克 (Andre Gunder Frank) 不得不承認：相對西方來說、非西方世界客觀地處於「不發展」(undevelopment) 階段，但他說這個不發展正是被西方「發展」而成，蓋後者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有賴世界範圍的資本累積，實即帝國主義。

待到 1998 年，他開始迎合「去西方中心論」潮流，發表了《白銀資本：重估全球經濟的亞洲時代》(*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但在客觀上仍要求必須有一個中心，於是鴉片戰爭前的中國遂被他重新發明

5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84-89, 149, 155, 166-168, 175.

6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pp. 298-316.

為「中心」。這個語帶雙關的「重新導向東方」之矯枉過正，在於把西方的經濟發展全說成是掠奪、西方的技術突破乃工業間諜行為，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被說成微不足道，只因為它們與西方沾上邊，而不理會它們乃普世之業。這位馬克思主義者亦步亦趨後現代、後殖民主義等當代顯學，搞得不湯不水。他這部 1998 年著述之唯一貢獻在於指出：西方未「起飛」前，世界上大半的白銀都集中在中國。這個強調，敦促論者將世界進入「近代」進程裡中國扮演的角色全盤重估。

中國作為一個全球史研究對象，在 1990 年代初仍未受舉世矚目，卻在 1990 年代末被視為與西方分庭抗禮的發展模式、甚至是人類的前途，也有一段辛酸史。1992 年美國半官方的智囊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了《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該書乃對 1991 年蘇聯解體的一個反應，確切地說：是肯定美國為冷戰的最後贏家。書中認為：歷史事件雖然不會停止，但全球各地將會朝西式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靠攏，雖然在這個大框架底下不會排除地方性差異。在此意義下，西式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成了普世價值。的確，在冷戰結束時，環顧當今之世，並無另一種模式可與西方模式抗衡。

福山之樂觀願景立即引起了反彈。美國政治學家巴爾巴（Benjamin R. Barber）在 1995 年發表的《聖戰對抗麥當勞化的世界》（*Jihad vs McWorld*）一書中指出 21 世紀將會是資本主義全球化與重新部落化的地方勢力對抗，最終勝利可能會歸於前者，但它不一定代表民主化的潮流。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 1996 年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之再造》（*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中也駁斥福山之非，認為繼冷戰時期之意識形態衝突結束而興者將是文明的衝突，尤其是伊斯蘭與西方文明的對抗。

但伊斯蘭狂熱分子不能代表「現代化」，它限於自己的小圈子，不能為世界各地提供一個普世楷模，甚至不一定能訴諸廣大的伊斯蘭世界。於是，有些人開始看好中國。人們是健忘的，中國當局 1989 年的「六四事

件」大鎮壓，發生在東歐集團瓦解的同年，惡名遠揚，正好替福山的世界民主化潮流不可擋之命題提供反面教材。但至 1996 年，當世界最大的零售商沃爾瑪（Wal-Mart）打入中國超巨型的市場，開始調動中國龐大無比的廉價勞力、製造大眾消費的日用品，中國就成了世界經濟的壓艙物。這個壓艙角色也被回溯地投射於全球史上頭。

法蘭克的《白銀資本：重估全球經濟的亞洲時代》正是這個回溯性投射的一環。白銀對近代中國經濟重要性之陡升，早經全漢昇指出：「中國白銀的購買力，在自北宋明末六百餘年的期間內，有長期增長的趨勢。」其一是需求量日增，其二是交易額的膨脹，尤其是大額的交易銀便於銅，而後者來源枯竭，前者則不斷由國外輸入。⁷ 全漢昇固然沒有談全球史，當時還沒有這個學域。在法蘭克《白銀資本》發表前兩年，加州大學中國史家萬志英（Richard von Glahn）亦於 1996 出版《財富之泉：中國從 1000-1700 之貨幣與貨幣政策》（*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一書。他不敢奢談全球史，很專業地限制在中國史範圍內，但宋代以來中國已成為首屈一指的耗幣大國的形象已躍然紙上。自宋代開始，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導致一股恆不能壓足的貨幣飢渴，一方面是銅幣變成國際通貨，為四鄰所用，造成大量流失，因為銅錢永不夠用，而且只是輔幣，大宗貿易依靠紙鈔，中國在宋代開始發行紙鈔，乃世界之首，這個嘗試一直繼續到明初而終於行不通，因此轉向大規模用銀兩，而患貨幣飢渴的中國經濟遂如一塊大海綿般吸收全世界的銀。中國龐大之需要將銀變成一種商品，它受黃金與銀之匯價波動，也會流進流出，造成一個世界性的銀市場。

萬志英引用法國學者蕭努（Pierre Chaunu）的估計西班牙的美洲銀有 1/3 流入了中國。⁸ 至 16 世紀下葉，中國進口的外銀，來自日本的卻達 60%。是否說：日本沒有新發現銀礦的話，西方的銀全部上桌也不夠壓足中國的需要？銀只適合於大額交易與賦稅制度，中國的市場交易仍大量依靠銅錢。即使如此，中國的前現代市場並

7 全漢昇，〈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冊（香港：新亞研究出版社，1976），頁 179-208。

8 Richard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 113.

無充分貨幣化，後者多集中在運河一線，在偏遠地區交易仍多以米和絲綢為通貨。然則，全球的銀是否只夠填中國境內大運河這條牙縫？萬志英讓讀者自己作出結論，但可想像比較史學家與全球史家會作出怎樣的結論。

八方風雨會中州：全球史、比較歷史學、後現代史學、甚至改弦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都合力重估世界近代化過程裡中國之關鍵性。中國史學界自不能置身事外。但中國史學家能掌握全球史者有如鳳毛麟角，還真的需要麥克尼爾那般重量級人物鳴鑼開道。但值得特別提醒的是：麥克尼爾與伊懋可一般，都用唐宋的先進去對照明清的脚步放緩、俾使西方超前的現象；法蘭克則將中國的領先地位晚推至鴉片戰爭前夜；從王國斌開始，則開始說中國與西方是分開在兩條道上走。他是當代另類現代化（alternative modernization）與多元現代性（plural modernities）思潮的時代產兒。

王國斌在 1997 年發表了《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該書仍不算全球史著述，它頂多比較中國與西歐兩地，但作者已警覺：以明清的江南地區與歐洲的英法荷比地帶作比較、而非含混的中西比較，才恰當。王國斌在該書中亦分判亞當·斯密式自由市場、商業資本、工業資本為三個層次。在第一層次上，18 世紀末的江南與西歐先進帶幾無差別，真正的「分流」始自西方發動煤和蒸汽的能源革命，其所以能為之，必先超越斯密式自由市場，走向商業資本之集中，迨至工業資本，則由集中淪為壟斷。換而言之，商業資本、工業資本到最後是摧毀亞當·斯密式自由市場的。與此相反，亞當·斯密式自由市場乃互通有無、讓大家都有一口飯吃，其理想形態最符合明清時代的中國：市場在中國是在政府指引下發揮「平準」與「均輸」功能、以豐補匱、以盈填缺、防止地域間與貧富間過度分化。

市場在西方的操作卻導致城鄉對立、農村破產、鄉下人口被驅入集中在城市的工廠、激化了階級矛盾，中國政府「教」與「養」的功能，歐洲人則留給教會去擔

當。中國政府的功能唯其是防止社會過度分化、民間資本無法集中，政府對田賦又能全面支配、無需與地方勢力討價還價，中國的抗租抗稅運動遂未走上納稅人爭取代議制的道路，更無資產階級奪權這回事。在王國斌筆下，近代早期的中國比較接近亞當·斯密理想的說法，似乎影響了麥克尼爾父子，在該兩位全球史家於 2003 年合著的《文明之網》（*The Human Web: 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中，即如此說：「日後亞當斯密（Adam Smith）分析倡言的分工的所有好處，都已經出現於宋代。」⁹

王國斌中西何時「分流」的命題，在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在 2000 年發表的《大分流：中國、歐洲，和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中獲進一步發揮。彭慕蘭與王國斌、萬志英等人被人歸入「加州學派」，關注點不同，但屬同一個路數。彭氏乃兼具全球史視野的中國史家，其論點可歸結為下列一句話：如無中國之存在，西方之「起飛」幾無可能。

在近代初期，西方征服海洋、用殖民、消滅土著與販奴締造了大西洋經濟圈，但要打入一貫先進的印度洋與遠東等古老經濟中心，則欠缺一張入門券，美洲的銀礦適時提供了票價。美洲銀流固然將地球上白銀流通量翻了不知多少倍，但如不存在能吸納之容體，亦無濟於事。君不見過多的白銀先經西班牙人之手，封建制的西班牙虛不受補、反被其淹死！幸好宋代以來的中國已發展成一塊超巨型大海綿。西方無什商品可以賣給中國，卻極需要中國的絲、瓷器和茶，唯有付現。正是中國這塊大海綿膨脹了西方的貿易額，在其經濟起飛期幫助後者累積了巨額的商業資本。

中國較西方離封建制更遠，市場活動不受基爾特約束，生產過程也不集中，其小環節都得通過市場相扣（這頗符合讓大家都有一口飯吃的原則）。唯物史觀使我們誤信中國是「封建的」自然經濟，其實明清的中國乃最接近亞當·斯密的理想，這個龐然大經濟體再加上政府稅制轉趨銀兩化（例如：張居正的一條鞭法），需要

9 Robert McNeill, William H. McNeill 著，張俊盛、林翠芬譯，《文明之網：無國界的人類進化史》（臺北：書林出版社，2007），頁 136。

的是天文數字的通貨，使中國恆存一股白銀飢渴。

彭慕蘭認為中國的存在幫助了西方的起飛，其關鍵在白銀，此說與法蘭克的觀點差別在哪裡？法蘭克雖然改了裝，仍是馬克思主義的底子，他視西方的崛起為蹂躪在非西方世界身上才成就的，在他的話語裡，後者的「不發展」是被前者「發展」而成，乃將馬克思原始資本累積說推廣為全球累積論、階級鬥爭演繹為國際窮富之對立。加州學派很明顯屬於新一代，在他們筆下，中國被化為最有潛力的消費市場與最大額的商機，中國並非被西方的原始資本累積壓榨了，而是中國這個世界最龐大的健康的經濟體將西方操控的全球經濟帶活了——這正是今日全球化時代的思維！

然而，唐宋過後，至明清時代，中國腳步開始放緩、西方則出現大躍進，加州學派予以重新概念化，將「落後」改名「分流」，但有否對伊懋可「高度的平衡陷阱」有所改進？伊懋可也不曾認為中國更有利於擺脫傳統經濟的條件到後來卻成為了障礙。彭慕蘭有他自己的清單：土地不集中不利於資本累積，在中國這樣地產權較鬆動的情況中，根本發生不了圈地運動。先爆發工業革命的英國受惠於豐富的煤礦，中國的產煤地卻離先進的江南地區甚遠。在突破傳統經濟的最後衝刺中，有煤缺糧亦將無補於事。在這方面，英國有美洲的殖民地，不只增添了產糧之地，也（透過移民）拓展了容納人口的空間。中國雖然也開拓了內部邊疆，但其成效不著，蓋其性質完全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海外殖民地。在工業革命前，中西未分流，中方甚至在某些方面條件更有利。迨英國 18 世紀末在能源與蒸汽方面出現突破，方才造成中西的「大分流」。

中國乃最早的市場經濟，以及後來遇到了瓶頸之說，也見於《帖木兒之後》這部不是專門談中西比較的全球史著述：「中國比歐亞大陸任何地方都更早地組合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元素，規模也比任何一處大。」但中國至 18 世紀晚期，糧食、燃料與原料的價格皆暴漲，人口之劇增，造成耕地面積排擠產棉田，燃料的需求危害了生

態。江南地區原本可以外求方式局部減輕壓力，但因為中國的水路運輸與市場經濟都很發達，使得低成本地區得以在同技術水平的情形下加入競爭，壓抑了先進地區。機械化是唯一出路，但中國的煤礦並非近在咫尺（彭慕蘭命題）。在該時期，印度也遇到了瓶頸，卻是由於水路運輸不發達、區際交易遭政局動盪隔斷，云云。¹⁰

近十年來有關中西分流的共識，可見一斑。威斯康辛大學的中國史教授馬立博（Robert B. Marks）循此路子，在 2007 年發表了《現代世界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提出了「依靠生物性的舊王朝」（the biological old regime）概念，亦即是靠人力、獸力、水力、風力為基礎的舊生存方式，現代世界之起源則是人類如何突破這個天花板。他採取了「加州學派」的說法：英國以工業革命為起點的「大分流」乃由一連串偶因促成，其中重要因素是中國納吐了大量的銀。在 1750 年前後，中國的產品佔世界總額 33%、印度與歐洲各佔 23%。1800 年後，英國、西歐、美國急劇起飛，至 1900 年，中國降至 7%、印度降至 2%、歐洲升至 60%、美國則升至 20%。¹¹縱使如此，資本主義制度並不穩當。1873 年的大蕭條促使德、意、俄、美等國對霸主英國豎起保護關稅籬笆，1930 年代的全球資本主義散架的情形可能提前來臨，幸虧英國在印度種鴉片售與中國，賺取極大的盈餘，付清對美、德的債務，才拯救了全球資本主義體制。在這裡，龐大的中國變成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安全閥。

如將馬立博歸入廣義的「加州學派」，則該學派深刻地影響了最具挑撥性的中國崛起論：馬丁·賈克（Martin Jacques）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與西方世界的終結》（*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該部 2009 年的暢銷書其實結合了加州學派內兩種意義頗為不同的「分流論」。第一種是認為西方在崛起前與同代世界其他先進地區無甚差別，崛起的那一刻就開始了「分流」。但「分流」也可以解釋為非西方的較先進地區未走上西方之路是因為有自已的道路，這條道路在輪到

10 John Darwin, *After Tamerlane, The Rise and Fall of Global Empires, 1400-2000*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08), pp. 41, 193-194.

11 Robert B. Marks, *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World, A Global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anham &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7), p. 123.

它們也崛起後，多半仍會繼續走下去。賈克的著作談過去的部分是交代中國「分流」的歷史背景，無甚新意，該書精彩處是目前「分流」之演變為分庭抗禮、以及在未來此「分流」將成為的主流之預測。

它首先破除西方在近代崛起乃由於人種優秀或文化優越的神話，指出這個「崛起」不能無視非西方地區在世界近代史中扮演的角色，這個角色甚至為西方之崛起提供了墊腳作用，尤以中國的角色為然。賈克採取白魯恂（Lucian Pye）的「中國乃一個假扮民族國家的文明」之命題，但它行將掙脫「民族國家」的緊身衣，恢復自身乃世界之中的信心。被西方暫時壓下去的「天朝」心態將以一種新的形式冒頭。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新朝貢體制將取代歐美以武力與財力為後盾的霸權。這個取代亦會反映在文化與價值觀上。中國體積龐大，它的轉化將是既快速又持久，將使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身具「發展」與「發展中」國家雙重身份，又兼它曾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此歷史經驗與它固有的價值皆使它偏離西式霸權的軌跡。中國會局部地與西方市場甚至民主體制「匯流」，但最終會露出它的本色，亦即與西方「分流」，乃因其本色乃經數千年歷史塑造而成的本性。中國本色將與西方價值競爭誰將成為「普世價值」。

「大分流論」至賈克可謂發展至極致。福山雖然沒有發明「匯流」一詞，但我們不妨視之為後冷戰的「大匯流論」（the Great Convergence）之祖，亦即是未來世界都將朝西方代表的普世價值認同。賈克卻預測，不只在經濟地位、國際領導，甚至在普世價值上，中國亦將取代西方；西方時代將成為歷史名詞。

賈克的《當中國統治世界》激發了伊恩·摩里斯（Ian Morris）於2010年發表《為何西方目前仍在統治》（*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他認為自己在西方中心論與加州學派兩極之間走出一條第三路線：西方目前之優勢並非先天或長期以來已鎖定，但亦非如加州學派所認為乃偶因僥倖所致。他仿照聯合國公布的國家發展指數，列出測量社會發展的四大指標：1. 都市化；2. 耗熱量（calories-consumption）；3. 資訊技術；4. 作戰能力，以圖表上的線條升降勾畫出歐亞大陸東西兩端（他在這裡顧不了印度）歷史性地你追我趕的軌跡。

該書所列之表格 2.1 圖表顯示除了日本的繩紋陶以及厚葬品該兩項外，歐亞大陸西端在馴養、馴植、城居、精製陶、文字各項都開始得比日本早；自舊石器時代末期至文明誕生期（14,000-5,000 BCE），歐亞大陸西端的曲線處於領先狀態；從西元前 5,000 至 1,000，歐亞大陸西端的曲線繼續領先，只有到了末端時，有往下掉的趨勢；從西元前 1,000 年至西元前 100 年，東西兩條線的弧度在他的圖表上接近平行，但西方的線條居上；元西前 100 年至西元 500 年該時段，東西兩條線都是先拱起後下垂，西方的線仍在上，但下垂的曲度較斜；唐宋開始了西方的晦氣期：中國的曲線超出西方，後者的線條並非坡度較緩升，而是整個地往下掉，以致於 1,100 年，兩條線如剪刀般張開；從宋代至明代，東西兩條線又呈現平行狀態，但西方的屈居於下；西方的線條自 1,800 年又開始上揚，也就是加州學派認為西方藉中國之存在這個偶因翻身的時刻。

摩里斯製作了一張反映人類全史總趨勢圖、即從西元前 14,000 至 2,000 年之今日的高空鳥瞰，顯示東西兩條線貼得很緊，但西方稍佔上風，唯有在從宋至明該段，東方線翹了上去一點點，西方線則凹了下來少許。加州學派認為中國長期以來領先西方，在摩里斯的圖表上不過是一條長弧線上暫時呈現的凸角。摩里斯在另一張突顯工業革命效應的圖表上已顯示：西方的線條自西元 1,800 開始上揚坡度之陡，直可以將此前近兩個千年各地的發展都夷為平地，換而言之，東西雙線皆變成貼地而爬，中國自唐宋開始出現的小幅度升揚無足掛齒。

然而，如他憑一份用過去投射未來走勢的圖表所示：進入新千年後，東西兩條線幾乎已貼在一起，東西的概念對人類的未來已變得無關宏旨。至 2103 年，世界如仍地分東西、並持續目前走勢的話，中國的那條曲線勢將超出西方。但摩里斯認為進入新千年後，圖表上東西兩條線已經緊貼，實在仍不免在湔美中國。他的論據是中國目前已成爲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借錢給美國購買中國的廉價商品、讓美國保持目前的生活方式，兩者已變成一個合體怪物：Chimerica。但在 1. 都市化；2. 耗熱量；3. 資訊技術；4. 作戰能力這四方面，中國的上升線難道真的已緊貼著美國的嗎？

摩里斯巧妙地在西方中心論與中國殊途（分流）論中走出第三路線。他維護了西方長期賽過東方的觀點，

但既然在宋至明時段東方曾一度超出西方，因此你不能指控他是西方中心論。他的西方領先論並非長期鎖定論——即由人種、文化先天注定的優勢。同時，他批判了加州學派用偶因論來解釋西方的崛起，這個偶因論變成喪失說服力的僥倖論——用「僥倖」解釋歷史，等於什麼都沒解釋。他的東西雙方將在 21 世紀匯流的說法卻非福山式的大匯流觀。他用來衡量先進與落後的四大指數：1. 都市化；2. 耗熱量；3. 資訊技術；4. 作戰能力，無一與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有關。他的所謂匯流只是並駕齊驅而已。在他筆下，只應用能數據化的普世指標，不談普世價值。

他的中國在 2103 年將超出美國的預測滿足了「中國統治世界」派的心理，但其實是一張空頭支票，蓋進入 21 世紀後，東西雙方的對立將失去意義，全人類至 2040 年將碰觸進一步發展的天花板，亦即是地球承载力達到極限。所謂並駕齊驅乃共同面臨末日之謂。摩里斯預測：人類如能找到脫解新危機的答案，至 2040 年後將會創造出一片新天地，否則將是「夜幕降臨」。東西方的歷史競賽之所以出現升與降，都是因為一方碰到了天花板、無法前進，才讓另一方超前。待至 21 世紀，碰天花板則變成了全球性的問題。

《夜幕降臨》(Nightfall) 乃科幻小說家阿西莫夫 (Isaac Asimov) 在 1941 年的一個短篇，至 1990 年被另一作家擴充為一部小說。故事有關一個受六個太陽照耀的星球，但有考古學家發現文明有每兩千年崩潰一次的週期，亦即是黑暗總有來臨的一日。摩里斯在這裡是用科幻想像巧妙地躲過了未來世界是「分流」還是「匯流」的辯論，同時將時下極紅的「大崩壞論」也包含入他的論述。目前，大歷史的書寫如果不包含生態史觀

點，將被判為不入流。¹² 在摩里斯的東西方你追我趕的歷程中，雙方都有碰到發展的天花板而掉了下來的時刻，亦即是週期性的大崩壞，以此解釋此起彼落。

他選擇 2040 年作為全球危機的臨界點，不知是否有意無意間受了萊斯特·布朗 (Lester R. Brown) 的暗示？這位環境學家在 1995 年發表了《誰將餵養中國？》(Who Will Feed China?) 一書，指出：如到了 2040 年，中國人口不能控制在 17 億左右，將會拖垮全世界，曾被中國當局指責為「新黃禍論」。當時，國際氛圍仍未允許中國走出天安門鎮壓事件的陰影，中國的雙位數字的成長率還未見火候。

今日的全球史似已達成共識：世界的近代轉化過程不能無視中國之存在，不能再堅持中國消極承受西方衝擊的陳舊觀點。這個新體會，不無當前主義 (presentism) 的味道。當今美國的國債超出 16 兆，最大的債主是中國，中國超巨型的勞動力市場又在替美國提供廉價消費品，這等於說中國借錢給美國購買中國廉價的消費品，變成了美國賴以持續目前生活方式得以不墜的生命維持系統。從小者觀之，世界最大的零售商沃爾瑪，作為一個私商經濟體其體積介於烏克蘭與哥倫比亞兩國之間，其賴以持續營業的支撐也是中國。因此，將中國這個舉足輕重的角色投射回到世界史上，是否有「沃爾瑪史觀」之嫌？¹³

「沃爾瑪史觀」令人想起傅高義 (Ezra Vogel) 在 1979 年提倡的「日本第一」論。¹⁴ 他為 1960 年代以來的「日本奇蹟」鳴鑼敲鼓，大有日本模式將取代西方模式之勢。曾幾何時，日本經濟即泡沫化，至今恢復無望。人們是健忘的，包括歷史學家在內，因此有在今時為當前流行的全球史留下一段記錄的必要。

12 20-21 世紀之交的「大崩壞論」似乎乃對 19-20 世紀之交的「文明沒落論」之回歸，其實兩者精神頗為不同。後者是悲嘆人工的文明脫離自然界的本能而趨於退化與頹廢，前者則是指人類文明破壞自然界造成的報應。「文明沒落論」乃危機時代的歷史哲學論壇，關注的是西方精神價值的危機。「大崩壞論」則促使傳統史學與環境學、生態學、古氣象學、古生物學等較「硬」的科學靠攏。

13 孫隆基，〈從愛麗絲夢遊中國到沃爾瑪史觀〉，載於香港《亞洲周刊》(2012.12.16)，頁 14-16。

14 Ezra Vogel (傅高義), *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 (日本第一：美國該學習)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